

“山金家”往事

高 峰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精英”（第六季）大型征文

—

有人说，一棵大树的高度，只有在它倒下时才能准确丈量，而我作为金克木先生的故乡人，更感兴趣的，冲动更加强烈的，还是探寻这棵百年大树深埋在八公山麓的根须。

金先生如是说：“在明末清初的农民大起义中，他的远祖一家从四川出来，最后流落到安徽寿州的凤台县……离县治不过五里路就是一些小山头环抱的谷中盆地……所以这地方就是以他们的姓为名，加上一个山字。”

这就是凤台县“山金家”地名的来历，至今依然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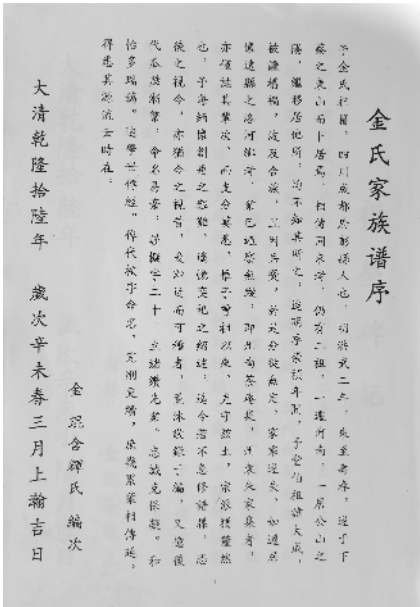
前些年，几个朋友，利用周末，结伴“驴行”，几乎踏遍八公山的每一座山岭沟壑。八公山是一座伟山，也是一座异山，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走路，心里始终带着某种期盼和遇见。有一回，在李冲乡的山凹里，朋友突然指着北边的一片嶙峋山坡对我说，翻过这道小山梁就是金克木先生的祖居地。当时听了，异常心动，无奈天色已晚，不容再向北行进。回来就查到了，那个地方叫“山金家”，住的几乎都是姓金的，同宗同祖。后来打听，更为具体了，包括老营子、大东注和小东注，三个村庄紧紧挨在一起。

二

季节的转换总是令人措手不及，甚至无法适应。三月初，气温突然升高，昨天还是棉衣冬装，今天见到城墙上的男女游人，居然穿起了短裙衬衫。北门的靖淮老桥下因为是引江济淮主航道，影响通航而被拆除，但通往凤台县的公交车还停在老地方，上车扫码付费，到点了，昏昏欲睡的司机从方向盘上放下双脚，用手转动方向盘，一溜烟开到八公山下。

风吹麦绿，油菜花顶着风在开，黄得灿然夺目。桃李还没开放，灰蒙蒙的半山腰里，时常有一团醒目的白，白得那么妖娆，那是性急的李树，它在那儿开得是何等的寂寞啊。

在茅仙洞景区大门口下车，这一回不去访仙问道，是寻访山凹里的金克木



图为金氏家族谱序

先生祖居“山金家”。

沿寿风大道一直往北走，几里开外，但见一架飞架，横跨马路，那是海螺水泥厂输送原料的设备。右拐，路旁停满了一辆又一辆庞大的散装水泥罐车，轰然而过，卷起令人窒息的巨大灰尘，路旁蒙蔽已久的店铺、山石、树木……好像沉睡不醒，没有吐露一丝春天的讯息。本来，山金家在我心中是一个躲进山凹成一统的“桃花源”，没想到给我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
过水泥厂，道路变窄，缓然上坡，没走几步，路旁的电线杆上挂一个校车停靠的牌子：山金家桥头站。再上面十字路口有一家小超市，门口坐着几位老人，打听山金家所在，回答，这里就是，不过现在叫淮磷村，淮磷村由大东片、小东片、山金东片、山金西片四个自然庄组成。

我们诉说来时蒙受的一路灰尘，老人告诉我。山金家因为地下富有矿藏，刚一解放，就不得安宁了。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这里是阜阳专区最大的煤矿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就通上了电。后来，发现磷矿，建磷肥厂，老人指指屁股底下说，我们现在蹲的地方，过去是运磷矿石的铁路专线。现在的水泥厂，已经无矿可采，原料都从外地从淮河水路运来，再用输送带送上来的。

我在想，藏龙卧虎之地，必有征象。亿万斯年，小小山洼，寂寂无声，那是它

在将息，在孕育。是金家一族，择此生息，开荒种地，冥冥中点化了这一片荒野之地，仿佛又预示了这里必将走出大智之人。

三

我掏出随身携带的《旧巢痕》，一边念给老人们听，一边打听金克木祖居情况。机灵的超市女老板坐在门口旧沙发的老人努努嘴向我暗示，我们直奔主题。老先生叫金卓成，今年85岁，耳朵有点背，但记忆清晰，他转身进屋，捧出了一本纸张陈旧的《金世家谱》，上面写道：“余金氏祖籍，四川成都府彭县人也，明洪武二年，来至寿春，遂于下蔡之东山而卜居焉。”

从此，一个外来户占据了这条淮河岸的小山窝，靠着开荒种地，安分守己，繁衍生息，开枝散叶，扎下深根。

大约在清朝道光年间，金克木的高祖叫立权公的，是金家五兄弟当中最小的弟弟，说不清楚竟当时是什么原因，也许是家务纠纷，这个读过一点书的小兄弟遭到了歧视，就带着家眷搬到了三十里以外的寿县城里，在城东北角的东岳庙旁边，靠亲戚的帮助居住了下来。

一个世代务农的人放弃土地，进城读书，是当时族人不能理解的，获取知识能否从此改变命运？这个小兄弟的儿子的确做到了，不过他的幸运是以生命为代价的。

金克木的曾祖，立权公的次子可铸公，字在谿，号容斋。光绪《寿州志》记其事：“金在谿，五品军功，粤逆陷皖，办练守御。当逆攻破城，有友人劝之逃，乃正色曰：‘吾辈读书，所习何事？生不能灭此群丑，与城共存亡可也。勿多言。’友泣而别。遂具衣冠，投水而死。旌表如例”。

一个读书人有如此气节，使得金氏后人引以为荣。金家得到褒奖，恩赏功名。嗣子金丽生，蓝翎五品衔。

金克木的父亲金沛田得到很好的培养，考取秀才，又补上廪生。此公聪明活络，是小县城中有名声的“才子”，在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，花钱“捐班”，买了一个县官。《金氏家谱》上说：“沛田公，字心农，同治十年入泮，光绪三年补廪，光绪三十一年任署义宁州”。

至此，从小山窝里走出来的金氏人家，通过四代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完成了由乡下人务农种田到进城谋生读书，再由读书获取知识改变命运，再进入所谓

的上层社会，获取财富后，进入仕途，谋求权力的全过程。

四

那么，到了第五代的金克木，他将要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呢？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？

1912年，在江西省万载县县衙门后面一所房子的一间偏房里面，一个“世纪儿”呱呱坠地了。没想到第二年，老来得子的县老爷就一命呜呼了，从此家道中落。

五岁的时候，金克木随家人辗转回到了寿县老家。九岁入寿县第一小学读书，13岁小学毕业。1927年，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，金先生被送往乡下躲避兵灾。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，从乡下回到城里的16岁的少年金克木，被信仰的火深深攫住。1928年农历7月，他干了第一件瞒着家人很有可能“闯祸”的事，充当寿县“城关党支部”到“凤台县特支”所在地白塘庙小学的秘密信使。

其实，这次送信，是城关支部对他的考验。到了白塘庙小学，他经受了保守秘密的考验。金克木先生在《真假信使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这些油印品是什么，男孩子心中一清二楚……是号召工农起来暴动的宣言，预定在这一两天内两县一起散发，造成声势的”。

白塘庙送信后的第二个月，1928年8月的一个早晨，十七岁的金克木到三十铺小学教书。“1928年秋，金克木等在三十铺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儿童团组织，发展团员四、五人成立了团支部。那时，团的书记由刘克烈担任，金克木任宣传委员”。（《寿县志稿》1963年末刊稿）。

这一年，从瓦埠镇小学到堰口集小学，从团城子小学再到三十铺小学，金克木先生在这一年行走的线路，正是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忧患中，中国共产党在寿县重组的线路图，是寿县革命史中的重要节点。在这半年，金先生学到了任何学校也学不到的东西，也迈出了从少年到青年的第一步。

1930年7月下旬的一天早晨。金克木手提简单的行李，从寿州城内东岳庙巷的尽头的家宅出来，直往北门外通济桥下的东淝河码头走去，靠岸有一只小小的带芦席篷的船正要开航。

这是19岁金克木，自称是一个“少年漂泊者”。一个少年突然转身离开故乡的背影，由模糊而越来越清晰。

淮河流过我的家

刘文勇

淮河，我生命流淌的血液。我与淮河、与淮河水，是分不开的。淮河，我的生命。

淮河人游泳，如吃饭喝水一样平常。淮河人，不会游泳，见水不亲，很少的。夏天那个辣辣的热，那个蒸笼般的闷，让人憋闷让人难受。跳进淮河扎个猛子、滚上几滚，其舒服、快活、爽乐，是不用说的舒服。不在淮河边上学，那是体会不到淮河人在河中洗澡的美好与意趣的。

村里，大人孩子，游泳高手多。最高的数老五，他长相有些黑，上胸凸起，肌肉鼓突，两条胳膊有力，扳手时，村人没人扳过他。他有不足，脚跛，走路一颠一颠的。在淮河里游泳，无论抢水、仰游，都快得如鱼在水里穿梭。别人没法撵上他。他扎猛子，这边没入水中，在十几米处那边出现。头往上一掣，露出水面一米高，再落入水中，用手一抹脸，然后手一扬，甩出手上水珠，飞在阳光下，水珠如五彩珍珠，如画好看。

老五常带一群伙伴到河对面吃瓜，河北人种的瓜，比南岸人种的瓜好吃。他只带水性好的朋友。差的，他不带。

淮河北岸人种的西瓜，大而圆，统统花皮，红瓤、蜜甜。孩子们眼馋，都想游过河去，摘一个，过过嘴瘾。但人家河北人看瓜严，被逮住，得叫村里干部去领。过去游过河偷瓜吃的，有被逮住的。被村干部领回后，没面子，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。

跟老五到淮河北岸吃瓜就不同了。那边看瓜的是他亲戚，那老年人特别喜欢老五。老五带的人，都能吃上瓜，临走，还能带着瓜游回南岸。

改革开放后，到淮河北岸吃瓜已成历史。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，南岸淮河

人种的瓜，比南岸人种的瓜好吃。他只带水性好的朋友。差的，他不带。

淮河北岸人种的西瓜，大而圆，统统花皮，红瓤、蜜甜。孩子们眼馋，都想游过河去，摘一个，过过嘴瘾。但人家河北人看瓜严，被逮住，得叫村里干部去领。过去游过河偷瓜吃的，有被逮住的。被村干部领回后，没面子，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。

跟老五到淮河北岸吃瓜就不同了。那边看瓜的是他亲戚，那老年人特别喜欢老五。老五带的人，都能吃上瓜，临走，还能带着瓜游回南岸。

改革开放后，到淮河北岸吃瓜已成历史。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，南岸淮河

人种的瓜，比南岸人种的瓜好吃。他只带水性好的朋友。差的，他不带。

在当年淮南城市发展过程中，“淮南子文化”与“大禹文化”的研究普及成为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，两者分别有“安徽省《淮南子》研究会”和“淮南市大禹文化研究会”作为学会组织支撑而深入开展，并已逐渐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。但二者之间的发展联系，仍未引起应有的关注重视，值得两个学会的同仁以及所有关心“淮南子文化”“大禹文化”发展的文化工作者们有所思考。对“淮南子文化”“大禹文化”之间的紧密关联与融合发展问题，结合理论和实践，或可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具体认识：

首先，“淮南子文化”与“大禹文化”并非截然无关，而是有着极为紧密的历史关联性。“淮南子文化”是基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及“淮南学派”共同撰著的思想巨作《淮南子》一书而历史形成的“经典文化”，是淮南城市文化古今演变发展中最具代表性、影响力的“绝代奇书”。刘安等人《淮南子》全书二十一篇里，对“大禹”及“大禹治水”的历史事迹有着较为频繁的论及，并将“大禹”视为中华上古时期的“圣人”“圣王”来看待，称赞其“劳形尽虑，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”“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”（《修务》）。可见，对“大禹文化”属于古代“英雄文化”“圣贤文化”的历史内涵，刘安等人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。《淮南子》一书是刘安等人为“刘氏”天下阐“道”论“治”的“帝王之书”，而“大禹”作为理想性的“圣王”代表，充分显示出“公天下”而“爱民”“养民”“利民”“安民”的优秀政治品格，自然就成为刘安等人为西汉统治者提出的“效法前贤”的重要对象。对“大禹治水”的历史功绩的肯定赞扬，对“大禹”人格精神的钦敬认同，让“淮南子文化”与“大禹文化”产生历史文化上的“亲缘性”“关联性”，能够紧密融合在一起，美美与共，一同走向现代性的“共生互利”的新发展。

其次，“淮南子文化”与“大禹文化”虽然各有侧重，但却有着内在的思想相通性。正因为刘安及“淮南学派”极为推崇“大禹”，十分认同“大禹治水”所体现出的“兴利除害”的“民本”政治理念及精神，所以“大禹文化”实际上在《淮南子》中转化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，成为被后人深入汲取融会的古典政治智慧。“大禹治水”，体现出的是中华先贤“公而忘私”“一心为民”的政治风范，“禹胼胝”“沐霪雨，栉疾风，决江湖河，凿龙门，辟伊阙，修彭蠡之防，乘四载，随山刊木，平治水土，定千八百国”（《修务》）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这不仅是“舍身为民”的“大公”精神，更是“实干兴邦”的治国理念。西汉王朝的“代秦而立”，同样是汉高祖刘邦“存亡绝续，举天下之大义，身自奋袂执锐，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”（《汜论》）的英雄所为。在刘安等人看来，西汉王朝的兴起便如“大禹治水”而“兴夏”一般，意味着王朝

人种瓜，也甜。南岸淮河人的夏季，家家有瓜田，户户有菜园，瓜类品种多，蔬菜如花园。消夏解暑家家有，不用到市场买。

淮河人，是吃淮河水的。很长时间，是用扁担，担着水桶，挑淮河水回来，倒进水桶储存。春季，水清亮朗朗，夏季，水浑不清，需明矾净水。净水时，手拿明矾，插进水桶，使劲搅水，把水搅得湍急，成飞转的漩涡，用劲搅，漩涡越旋越深，陀螺般滴滴溜溜地团团转，泥沙纷纷沉淀，水越来越清。

我用扁担挑水，很长时间。工作后，一回家，就摸起扁担挑着水桶，到淮河挑淮河水，直把父母水桶挑满为止。

担水，要到深水处。河水上水浅，水质不好。到淮河边，先脱掉鞋，赤着脚，到深水中去，水清，杂质也少，低下头，喝上一口淮河水，好甜好甜的。担起两桶水。过十几米的河滩，再翻坝子，坝子高，坡陡，重担在肩，攀高越顶，两脚紧紧地抠住泥土，一步步地慢慢走。

别人担水觉得累，我却觉得担水是乐趣，担着水桶，稳着步，压着担子，这边肩膀疼了，就两手抓着肩的两边扁担，轻轻地、慢慢地将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。这时，人轻松了，肩不疼了，悠悠地跨着流水般的小步子，有韵律地往前走，真是颇诗意的。

现在村人吃淮河水，不用担了。政府为村民安上了自来水，家家户户烧水煮饭，水龙头一拧，清亮的淮河水哗哗地流下来，就非常方便。过去水浑，要打矾，现在自来水，经过消毒过滤，卫生又安全。

淮河，我的生命；清清的淮河水，静静地从我家流过。

人种的瓜，比南岸人种的瓜好吃。他只带水性好的朋友。差的，他不带。

淮河北岸人种的西瓜，大而圆，统统花皮，红瓤、蜜甜。孩子们眼馋，都想游过河去，摘一个，过过嘴瘾。但人家河北人看瓜严，被逮住，得叫村里干部去领。过去游过河偷瓜吃的，有被逮住的。被村干部领回后，没面子，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。

跟老五到淮河北岸吃瓜就不同了。那边看瓜的是他亲戚，那老年人特别喜欢老五。老五带的人，都能吃上瓜，临走，还能带着瓜游回南岸。

改革开放后，到淮河北岸吃瓜已成历史。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，南岸淮河

人种的瓜，比南岸人种的瓜好吃。他只带水性好的朋友。差的，他不带。

在当年淮南城市发展过程中，“淮南子文化”与“大禹文化”的研究普及成为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，两者分别有“安徽省《淮南子》研究会”和“淮南市大禹文化研究会”作为学会组织支撑而深入开展，并已逐渐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。但二者之间的发展联系，仍未引起应有的关注重视，值得两个学会的同仁以及所有关心“淮南子文化”“大禹文化”发展的文化工作者们有所思考。对“淮南子文化”“大禹文化”之间的紧密关联与融合发展问题，结合理论和实践，或可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具体认识：

首先，“淮南子文化”与“大禹文化”并非截然无关，而是有着极为紧密的历史关联性。“淮南子文化”是基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及“淮南学派”共同撰著的思想巨作《淮南子》一书而历史形成的“经典文化”，是淮南城市文化古今演变发展中最具代表性、影响力的“绝代奇书”。刘安等人《淮南子》全书二十一篇里，对“大禹”及“大禹治水”的历史事迹有着较为频繁的论及，并将“大禹”视为中华上古时期的“圣人”“圣王”来看待，称赞其“劳形尽虑，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”“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”（《修务》）。可见，对“大禹文化”属于古代“英雄文化”“圣贤文化”的历史内涵，刘安等人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。《淮南子》一书是刘安等人为“刘氏”天下阐“道”论“治”的“帝王之书”，而“大禹”作为理想性的“圣王”代表，充分显示出“公天下”而“爱民”“养民”“利民”“安民”的优秀政治品格，自然就成为刘安等人为西汉统治者提出的“效法前贤”的重要对象。对“大禹治水”的历史功绩的肯定赞扬，对“大禹”人格精神的钦敬认同，让“淮南子文化”与“大禹文化”产生历史文化上的“亲缘性”“关联性”，能够紧密融合在一起，美美与共，一同走向现代性的“共生互利”的新发展。

其次，“淮南子文化”与“大禹文化”虽然各有侧重，但却有着内在的思想相通性。正因为刘安及“淮南学派”极为推崇“大禹”，十分认同“大禹治水”所体现出的“兴利除害”的“民本”政治理念及精神，所以“大禹文化”实际上在《淮南子》中转化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，成为被后人深入汲取融会的古典政治智慧。“大禹治水”，体现出的是中华先贤“公而忘私”“一心为民”的政治风范，“禹胼胝”“沐霪雨，栉疾风，决江湖河，凿龙门，辟伊阙，修彭蠡之防，乘四载，随山刊木，平治水土，定千八百国”（《修务》）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这不仅是“舍身为民”的“大公”精神，更是“实干兴邦”的治国理念。西汉王朝的“代秦而立”，同样是汉高祖刘邦“存亡绝续，举天下之大义，身自奋袂执锐，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”（《汜论》）的英雄所为。在刘安等人看来，西汉王朝的兴起便如“大禹治水”而“兴夏”一般，意味着王朝



又是一年插秧季
张旭摄

臊泥塘巷

王晓珂

人的情景，感觉像换了一个巷子一样。时代变了，环境和生活都变得干净、清洁和更好了。

如今的臊泥塘巷子里中段，往北的过道里还留有一面土坡墙，用四根旧木棍斜撑着。这一面墙上，依然保留着一扇木门和一个用五根木条格的小窗，风穿过木格，窗内白云，窗外蓝天，我走近前摸一摸土墙，风化，皲裂，脱落，仿佛一下子就触碰了岁月的痛，而一枝藤蔓正悄悄地爬上墙顶，在风中摇曳。

小城里的古井很多，几乎每一个巷子都有井。井名也是意味深长，比如什么三眼井、旗子井、大钱井、八卦井、九龙井等等，流传着许多的轶闻趣事。臊泥塘巷子里也有口井，靠路南，现在已经被填实了，井石依在。孙奶奶说她十几岁时嫁到臊泥塘巷，常到井边洗菜洗衣服。她说以前井的四周呈簸箕型，北宽南窄，并位于中央。圆形的井口有十八绳道，这个井叫十八罗汉井。于是我

来到古井旁，数了数，果然是十八道井绳凹槽。十八罗汉，于是就联想到距离巷子不远处的圆通寺，古时的十八罗汉塑像就在寺里。最初这口井是不是圆通寺里的和尚在此建造的呢？时间久远，已无处考证。但小巷留有一个这样的传说，清乾隆时期，小巷里住着一户人家，有个女儿叫小莲，苗条俊秀，常常在罗汉井边洗衣。圆通寺里有个叫阿福的年轻和尚也常到井边挑水，一来二去，阿福喜欢上了小莲，而小莲也钟情于阿福。在一个夏天早晨，他们私奔去了阿福老家的一个村庄，耕田种地，相依相守。据说他们后来儿女满堂，有个儿子考取进士，听说小莲和阿福年老的时候曾回到小巷来过，已匆匆而去。

古时这个巷子里住的都是贫民阶层。靠近巷子西口住着一个李老奶奶。今年也已经九十多岁了，搬到这里住有几十年了。她说他们家是“使船人”，也就是船民，这里距离北门很近，过去都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（第三季）征文

臊泥塘巷很短，位于寿县古城北街北段，西连北街，东通小巷。步行也就是一百五十步左右的距离。在古时没有扩街之前应该二百步左右。很久以前这里是低洼的巷子，巷子里的下水道都是明沟，明沟的底部，因有树叶、垃圾等杂物，长年累月发酵，形成一种散发臭味的泥糊子。人们走在中间的一条石阶小路上，两边散发出一股臊泥味，这也是臊泥塘巷的由来。而在农村，“臊泥”却是非常有用的农家肥。过去有经验的农民，都知道“臊泥”的肥力很好，秋种时，把那“臊泥”运到地里，一季小麦的生长，就靠它了。

每当经过这个小巷，走在铺满青石板的小路上，回想小时候走过那臊泥熏